

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任務和作法（上）

汪學文

一 前言

大陸的高等學校，自五十七年七、八月間毛共「工人宣傳隊」進駐以來，雖然歷時已達九個月，而且「宣傳隊」的組織和實力業經擴充、加強，例如「首都工人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已擴編為「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其他各高等學校亦大都是「軍管」「工管」合二為一，聯合控制，但是，迄今不僅教學秩序仍未恢復，改革工作鮮有進展，反而由於「宣傳隊」和學生的對立，情況更趨複雜而混亂，以致使得毛共大為緊張，高呼什麼「學校的問題不解決」，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便不能取得全面勝利」，而且隨時可能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以上海言，正因為「宣傳隊」和學生對立狀態十分嚴重，毛共「文匯報」曾對各大學的學生大肆抨擊說：「從全市來看，真正『老大難』的單位，首先還是大學；『以我為中心』很有市場的地方，是大學；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最膨脹的地方，是大學；逍遙派最多的地方，也是大學。」接着，「文匯報」又說：「解決大學的問題，要比解決一個工廠武鬥的問題艱巨得多，複雜得多，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解決這些單位的問題看作輕而易舉。」

以北平言，在「文革」初期最活躍的高等學校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以及北京航空學院等。然而這些學校，現在却處於混亂狀態之中，問題叢生。偽「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匪富治曾說：「只要北大、清華的問題解決了，全國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註一）當時謝匪富治所說的「問題」係指武鬥而言，但是這兩個學校的「問題」，顯然並不局限於武鬥，而且有些問題似乎比武鬥更難解決。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共的「第一支工人宣傳隊」首

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任務和作法

先進駐清華大學，八月五日，毛曾把外國人士贈送的芒果，轉送給該隊，八月十五日，毛曾又接見了該隊的代表，以資鼓勵，這證明毛匪澤東對於這個「宣傳隊」特別重視，同時也顯示出清華大學的問題不簡單。以該校的「革命委員會」來說，直到五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始宣告成立，但其人選却仍未公佈。在這個「革委會」中，原來的幹部被排斥，紅衛兵頭目被摒棄，並由「宣傳隊」全面控制，乃是意料中事。不管如何，清華大學遲至今年一月開始建立「革委會」，顯示了這場權力鬥爭的複雜性和艱苦性，也顯示出清華大學內部必然發生過尖銳的反覆的鬥爭，包括文鬥和武鬥，否則斷不會比西藏、新疆這兩個複雜地區成立「革委會」的日期還要遲緩。據匪「新華社」一月二十八日報導說：「在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上，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首都工人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革命師生員工代表先後講話。他們說，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註二）這就表示，今後的鬥爭還會繼續出現，而且非常艱苦。

至於北京大學，毛共「宣傳隊」也遭遇到困難。據匪指出：北京大學是個有七十多年歷史的大學，「封、資、修的流毒比較深，知識份子隊伍比較複雜，許多全國有『名氣』的教授在這裏任教，其中相當一部份人是搞意識形態的，有些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面對着這樣一些複雜的情況，有一些師生中產生了『北大特殊』的思想。」同時，「北京大學是個綜合性大學，文科佔了很大比例，許多人都是搞意識形態的，同其他理工科大學比較起來，也確實有其更加複雜的情況。在文、史、哲這三個系的新老知識份子中，有一些人寫過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和著作。」在這種情況下，毛共「宣傳隊」遂產生了「落實團結、教育、改造知識份子的政策

，在理工科比較容易，在文科就不好辦」、「在別的地方能够做到，在北京大學難做到」等畏難心理；並且因而出現了「不敢積極主動地落實黨的政策，消極地等待上級機關定『調調』、劃『杠杠』」的現象，使鬥、批、改運動難以深入發展。（註三）

此外，就「教育革命」言，高等學校也是落後的。據毛共「文匯報」透露：「從上海地區來看，中、小學教育革命的進展要比大學來得快。中、小學開展教育革命，我們開始有了一些經驗，大學怎麼辦，我們經驗還不多。」（註四）

面對着如此的「老大難」單位，毛共「宣傳隊」究竟肩負了那些任務、推行了那些工作，以及採用了那些做法，實為當前研究共匪高等教育所應注意和探討的課題。

二 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任務

（一）鬥批改 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首要任務，就是進行「鬥批改」。當「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之初，姚文元即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而且文章開頭便說：「一個偉大的鬥、批、改的高潮正在到來。毛××最新指示的發表，浩浩蕩蕩的產業工人大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進學校和其他一切還沒有搞好鬥、批、改的單位，是這個高潮到來的信號。這個高潮，是經過成立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等一系列工作之後出現的，它將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衝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教育廣大人民，粉碎階級的反動派，引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大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毛共「紅旗」雜誌五十七年第二期除刊載這篇文章外，還轉載了上海「工人造反報」第一五五期社論「馬蜂窩就是要捅」。這篇社論指出：「在大好形勢中，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各條戰線上還存在一些『老大難』單位。這些單位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就是搞武鬥。……對這些『老大難』的馬蜂窩就是要捅。」「『老大難』難在那裏？有少數單位，就是『難』在『壞人掌權，好人受氣』。在這些單位裏，一小撮壞人竄奪了領導權

，他們『對外抵制，對內控制』，『對上封鎖，對下高壓』，壓制羣衆，打擊報復，實行白色恐怖，大搞武力統治。特別嚴重的是，封鎖以毛××爲首、林副××爲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聲音，蒙蔽和欺騙羣衆，使自己單位成爲『水漲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老大難』選『難』在有些頭頭中了反動的『多中心論』的毒，資產階級派性十足。他們佔山爲王，認友爲敵，迷信『實力底下出政權』，大搞『以我爲中心』。」因此，「紅旗」雜誌並加編者按語，強調「工人階級不但應當在工廠企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而且應當在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的鬥、批、改中充分發揮自己的領導作用。」

在學校「鬥、批、改」中，又以「鬥」爲主要任務。而「鬥」的對象，就是學生、就是「紅衛兵」。換言之，「宣傳隊」的任務，就是鎮壓和整肅「紅衛兵」。這一點，姚文元的文章曾明白指出，他說：「單靠學生、知識份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務」；而「知識份子糾纏不休、不能解決的矛盾，工人一到，很快就解決了。隱藏在幕後挑動羣衆鬥羣衆的一小撮壞人，只有在工人、解放軍的參預下，才能把他們的反革命面貌徹底揭發出來。」

（二）清理階級隊伍 姚文元所說的「隱藏在幕後挑動羣衆鬥羣衆的一小撮壞人，只有在工人、解放軍的參預下，才能把他們的反革命面貌徹底揭發出來」，就是要「宣傳隊」去「清理階級隊伍」。因此，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另一個重要任務，乃是「揭發隱藏的壞人」，以「清理階級隊伍」。

毛共「宣傳隊」對於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也如同執行「鬥、批、改」任務一樣，大力去推行的，例如：

在「中山醫學院」——據說，廣州「中山醫學院」歷來是「階級鬥爭複雜的戰場」，裏面有「一伙頑固不化的反革命份子」，「文化革命」以來，不僅保了「被打倒的走資派」，而且包庇了「中山醫學院內的地、富、反、壞、右、國民黨殘渣餘孽」；「國民黨殘渣餘孽竟狗胆包天，過他們的國民黨組織生活，交國民黨黨費」。於是「宣傳隊」乃遵照毛曾「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導，充份發動羣衆，做「受蒙蔽的羣衆」的政治思想工作，經過「一番努力」，除了「把公開的階級敵人端出來」以外，「連長期被走

資派包庇的，混進革命隊伍裏的一小撮階級敵人國民黨殘渣餘孽也統統挖出來。例如一個披着「副教授」外衣的國民黨特務，長期以來幹着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勾當，混入羣衆組織，到處煽陰風，點鬼火，給美蔣特務端供情報。」同時，「宣傳隊」並以這一活生生階級鬥爭現實爲對敵鬥爭活教材，去揭發「中國黑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以提高該院師生員工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覺悟。（註五）

在「江西醫學院」——「江西醫學院革委會」在「駐校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軍代表」的幫助下，繼續進行「狠批、深挖、細找」的工作。

據說，他們「不是光依靠少數專案人員搞專案調查，而是最大限度的幫助羣衆、依靠羣衆，打一場深挖細找的人民戰爭」；至于「挖出隱藏得很深、偽裝得很巧妙的階級敵人」，他們「除了組織專人，查專政機關保存歷史檔案以外，主要的是緊緊依靠羣衆，大活活檔案……一方面深入發動羣衆，造成強大的政治攻勢，大擺線索，大揭蓋子，另一方面，發揮黨的政策威力，開展政策攻心，分化瓦解敵人，對羣衆揭發出來的懷疑對象，組織專人進行揪辮子，把敵我矛盾的問題清出來，及時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把調查的情況，再交給羣衆進行充份討論，做到了穩、準、狠的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註六）

在「河北大學」——據匪「新華社」透露：「在對敵鬥爭中，駐河北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遵照毛××關於『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教導，對一小撮階級敵人採取了區別對待、分化瓦解的政策，有力地打擊了一小撮最頑固的階級敵人。」（註七）

在「北京大學」——據說在清理階級隊伍開始時，「階級敵人煽陰風，點鬼火，妄圖蒙混過關。有些師生也產生『寧左勿右』的思想」，面對這種情況，「宣傳隊」乃一方面「狠狠地打擊階級敵人破壞政策落實的陰謀詭計」；一方面「用落實政策中的階級鬥爭事實教育羣衆，肅清極『左』思潮的流毒」，「使政策更深入地武裝了羣衆，更有力地孤立和打擊了一小撮最頑固的階級敵人。」（註八）

由上可知毛共「宣傳隊」在高等學校執行「清理階級隊伍」任務時，手段毒辣，鬥爭激烈。

（三）再教育

毛共「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的另一任務，乃是對知

識份子實施再教育。「宣傳隊」對待「知識份子再教育」這一工作的態度，據說有三種情況（註九）：

一是「急躁」，急於求成——持這種態度者，往往是「恨鐵不成鋼」，「想在一個早上就把知識份子改造好」。毛共認爲這是「一種不現實的想法」，「對知識份子進行再教育，一定要採取積極態度，但是，積極決不是急躁。知識份子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場革命，必須經過長期的甚至痛苦的磨煉。資產階級思想的頑固性，決定了再教育的艱巨性。」同時，「思想改造是靈魂深處的大革命，看不見，摸不着，它不同于武裝奪取政權，也不同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變，不是一次或若干次革命行動所能徹底解決的問題。」毛曾曾指出：「知識份子的改造，特別是他們的世界觀的改變，要有一個長時期的過程……我們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細緻的工作，不能企圖上幾次課，開幾次會，就把人家在幾十年生活中間形成的思想意識改變過來。」（註一〇）因此，「任何急于求成，以至採取一些簡單的做法，是不能取得預期效果的」。

二是「坐等」，消極坐等——持這種態度者，「實際上是放棄了積極促進知識份子改造的責任」。毛共認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實踐已經清楚地證明，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單靠本身力量是不能實現的。知識份子的思想轉變是內因起決定作用，但外因也是不可缺少的。」「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而這條條件就是「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因此，「決不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採取消極等待態度」。毛共並提出警告說：「不對知識份子進行改造，同他們不健康的思想作風和平共處，就有可能反而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糖衣砲彈所擊中，被他們所溶化。這種教訓已經有了，很值得我們警惕。」

三是「促進」，即「從知識份子現狀出發，積極進行再教育，促進知識份子逐步實現思想革命化」。——毛共認爲這種態度是正確的。並指出：對於「進步較快的」，要以「不斷革命的精神」，幫助他們「沿着毛××指引的革命道路繼續前進」；對於「進步較慢的」，「不是輕視他們，看不起他們，而且親近他們，團結他們，說服他們，鼓勵他們前進」，以達到「宣傳隊一到，人換思想校換貌」的境地。

「宣傳隊」對於「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態度，據說也有兩種情況：

一是「不沾邊」的態度——持這種態度者，認為「這些人有幾個不多，無幾個不少，拉不拉他們無足輕重。」毛共認為這種「無足輕重」的態度是不對的。並且強調地指出：「我們不重視，敵人却很重視；我們不拉，敵人拉。」「不堅決把這些青年人拉過來，就會給階級敵人以可乘之機，客觀上就會起到把他們推向敵人一邊去的作用。」

二是「白費勁」的態度——持這種態度者，認為「老子反動，兒子也好不了，拉他們是白費勁」。毛共則指這種看法沒有從政治上作具體的分析。同時並強調「父母對子女是有很大影響的，看不到這一點是錯誤的。但是，人的思想感情、政治態度，並不僅僅由家庭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家庭只是社會存在的一個方向，而不是社會存在的全部。」

據說，「這些青少年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常常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優越感，後來父母出了問題，又覺得抬不起頭來，不願同周圍羣衆接近，有的人甚至有對立情緒。」一般說來，這些青少年（即紅衛兵）的思想狀況大約有三：

一是「一落千丈」——這是他們「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後地位變化的估計」，過去，他們「總覺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稱為「當然的革命接班人」；如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他們『落』下來了，從高高在上、脫離羣衆的危險地位落到工農兵中來了」，而且還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難免不勝今昔之感。

一是「老子倒台，兒子倒霉」——這是「血統論」的持續，也是實際的感觸。然而毛共却強調「對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倒台，是拍手稱快，還是黯然神傷，這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立場問題。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就決不會認為自己倒霉，相反，而會認為是一件大好事。如果劃不清階級界限，才會認為自己是倒霉。」

三是「這一輩子完了」——這是他們對自己前途的看法。毛共認為「只要自己能劃清界限，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今後的一輩子，不是完了，而是大有可為，可以對人民作出有益的貢獻。」（註一）

由上可知，「宣傳隊」與青年學生之間，在思想、情緒、和態度上，已經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況。因此，毛共不得不承認：「要把他們（青年）拉到無產階級一邊來」、「要把他們（青年）改造好」，乃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四）教育改革

毛共「宣傳隊」既強調要永遠「佔領學校」、「領導學校」，其另一項主要任務，自然就是推行「教育革命」。但是，「宣傳隊」進駐高等學校後，由於「新問題」「新矛盾」的產生，使毛曾不斷指示進行的「教育革命」陷于停頓狀態，較中小學教育的改革遠為落後。直到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始在「社會主義大學應如何辦？」的通欄標題下，發表編者按語，和進駐「清華大學」、「復旦大學」、「遼寧大學」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文章，「號召工農兵、革命知識份子和幹部發表意見展開討論」。

這些文章透露，目前「對待舊的教育制度的改革」，計有三種態度：

- 一種是「認為舊的大學不見得差，主張原封不動」；
- 一種是「認為舊大學要改，但只是修修補補即可」；
- 一種是「工人階級主張的徹底革命」。

第一種和第二種「態度」，顯然是毛共「教育革命」的重大阻力，也是「教育革命」之所以遲遲不能獲得進展的主要原因；至于第三種所謂「徹底革命」，如今仍為「一廂情願」的主張。

此外，據說「有些急躁的同志主張：大學既然這樣糟，乾脆不辦了」；還有些人口頭上叫「要改革」，但却認為「工宣隊領導鬥批可以，領導改不行」、「外行改不了內行」。這些也是「教育革命」的重大阻力。

對於「綜合性大學教育革命」，駐復旦大學的「宣傳隊」提出了五項具體主張：

1. 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即「毛澤東思想的一元化領導」。廢除原來的對綜合大學的雙重領導，由「省（市）革委會」直接負責。建立一個「以工宣隊代表、解放軍代表為主，有革命學生、革命教師、革命工人代表參加的堅強的領導班子」。

2. 綜合性大學的培養目標應該是：「無限忠于毛××，有較高的兩條路線鬥爭覺悟，全心全意為工農兵服務，具有無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

解決實際問題，批判資產階級的能力和一定的專業知識的普通勞動者」。廢除資產階級的「高考制度」（即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和統一分配制度，「招生即通過各級革命委員會選拔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到大學學二、三年左右，又回到實踐中去」。「國家」需要培養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和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也通過各級「革命委員會」選拔推荐。

3. 現在的綜合大學的體制重疊煩瑣，必須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需要，分別進行精簡、合併或者增設。如生物系過去不為工農等生產服務，不研究馬、牛、羊、棉、油、糧，盡鑽「牛角尖」，可以把有關專業併入農學院、林學院、醫學院。有些系，如新聞系，根本培養不出「革命的戰鬥的新聞工作者」，可以不辦。

4. 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教師隊伍。選拔一批工農兵的優秀份子作為教師隊伍的骨幹，聘請一部份各條戰線的領導成員作為不定期上課的兼職教師、在

對舊的教師隊伍進行整頓、清理、改造的基礎上，留下一部份作為專職教師。教師隊伍實行「三三制」，一部份人任課，一部份人參加「三大革命運動」和進行調查研究，一部份人下廠下鄉或到匪軍鍛鍊，三部份人定期輪換。

5. 整個教學工作必須以「五、七指示」為綱，以毛著作為基本教材，以階級鬥爭為主課。可以通過自辦工廠、廠校、社校掛鉤等方式，建立文、理科的教學實踐基點，使學生定期參加實踐。

這三個大學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似乎並不比五十六年「上海同濟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林學院」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更完備可行。「同濟」等三校的方案迄未推廣，甚至其在各該校實驗的成果亦未見報導，或已「胎死腹中」；因此這類由「復旦」等三校提出的方案，能否作為樣板，仍大有問題。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叢書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汪學文

本書為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汪學文先生繼「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後又一新著，都五十餘萬言。中共文化大革命之真象，無論研究國際關係或治近代史者，均視為重大問題；而紅衛兵運動對中共文革影響之深遠，更不言而喻。本書內容係以中共文革之發展歷程為經，以每一階段之紅衛兵活動為緯，縱橫交織，組構成中共文革之全貌，並闡述其對中共政治、文化、經濟、社會諸方面產生之影響，而予以客觀之評價。取材嚴謹，分析精闢，極具參考價值。

本書凡七百三十餘頁，二十四開本，平裝一厚冊，每冊定價新台幣壹佰元（航空另加郵資），讀者可逕向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本所出版組洽購；或以郵政劃撥儲金賬戶第三四三六號訂購，當即寄書。

國外：
航寄：美金六元五角
平寄：美金二元五角